

决定着一定历史时期、一定范围内的政府与大学关系的两个“容忍度”的动态平衡走向。因此，校本特征是政府与大学关系的两个“容忍度”动态平衡的基本特征。哥廷根大学、哈勒大学和柏林大学共同演绎而成的“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是对当时政府对大学要求的呼应。特别是，洪堡作为普鲁士时期的教育大臣创办柏林大学，说明自治和自由理念本身就代表着政府意志。随着洪堡思想漂洋过海，传入他国，柏林大学与政府间两个“容忍度”的动态平衡就决定着当时所有政府与大学关系的两个“容忍度”动态平衡走向。无疑，威斯康星大学是政府与大学两个“容忍度”“C + B”模式的平衡历史时期的“领头羊”。1904年就任威斯康星大学校长的范·海斯主张：“教学、科研和服务都是大学的主要职能。”^[14]随之，威斯康星大学成为继柏林大学之后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威斯康星思想”传遍世界。“威斯康星思想”当然是威斯康星大学的，但同时也属于美国政府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教育研究与革新中心的报告指出：“从历史上看，大学为社会服务的观念源自于美国赠地学院创办的时代。”^[15]因此，威斯康星大学与政府间两个“容忍度”的动态平衡就决定着这一时期所有政府与大学关系的两个“容忍度”的动态平衡走向。美国当代著名教育家克拉克·科尔曾对不同时代的大学有过形象的比喻，在他看来，纽曼的“大学”是一个居住僧侣的村庄，弗莱克斯纳的“大学”是一个由知识分子垄断的城镇，而他的现代多元巨型大学（multiversity）则是一个五光十色、魅力无穷的大都市。^[16]那么，这种多元巨型大学就是高等教育类型、形式得到极大丰富的结果，而这也是政府对大学行为“容忍”的结果。因此，多元巨型大学与政府间容忍度的动态平衡就决定着当今所有大学与政府两个“容忍度”的动态平衡走向，这也正是当今世界高等教育五彩斑斓的原因之所在。

四、政府与大学关系中两个“容忍度”动态平衡的优化

大学自诞生以来，长期处于“要么自治，要么被政府控制”的两极状态，而实现动态平衡的时间也不过140年左右。当前，政府与大学关系虽然总体上处于一种和谐的动态平衡期，但仍存在一些体制和机制上的问题，有待进一步优化。

1. 增强政府自身的位置感

从上面我们的分析中，不难看出，在政府与大学关系两个“容忍度”的动态平衡中政府起着主导作用。“B + B'”模式的动态平衡，说明政府与大学二者处于最大容忍度的重要性，政府对大学自治要表现出最大的容忍，大学对政府控制也要表现出最大程度的接受，如此这般即可形成政府与大学关系的理想状态。或者可以理解为，在政府强势的情况下，只要政府主动地包容大学自治，大学一方也会接受政府对己方的控制。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在世界大学发展史上，似乎没有出现过当政府对大学自治的高度认可时，大学对政府控制却不以为然，表现出极大排斥的“B + C'”模式。这又似乎再一次说明了政府对大学自治最大容忍的重要性，以及其所起的主导作用，因此，政府需要摆正心态，回归本位。

政府增强自身的位置感，就是要引导政府定好位，守好位，不越位。怎样才能做到呢？或许著名哲学家涂又光的“3Li”理论能给出一个较为合理的答案。他认为，社会生活分为政治、经济、文化三个领域。在这三个领域中，存在着起主要调节作用的基本元素。政治是“力”（权力，power），经济是“利”（profit），文化是“理”（道理、真理，理性、知识，truth）。“力”、“利”、“理”的汉语拼音都是“Li”，所以是“3Li”。“3Li”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政治领域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力”，辅之以“利”和“理”；经济领域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利”，辅之以“力”和“理”；文化领域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理”，辅之以“力”和“利”。^[17]大学是教育和学术机构，属于文化领域，应以“理”为主，“力”和“利”只起辅助作用。因此，就大学教育而言，大学是主角，政府处于辅助地位，这就是政府的本来定位。

其实，此文语境下的政府位置感，也包含政党在与大学关系中的定位。“借着各种文化和思想形态的手段，将政党意识形态所体现的阶级内涵与价值诉求转化为全社会普遍认同的主流社会意识，既为政权提供合法性基础，也为提高政党的动员能力提供可靠的保证。”^[18]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党决定着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边界。^[19]我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决定了大学要实行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是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主要特色。其实，对于几乎都是“学校 + 社区”结构的中国大学